Globethics Repository



在经典互读中的文明对话与宗教学研究：与英国剑桥大学大卫・福特教授的访谈 [Cross Cultural Dialogue and Religious Study in Scriptural Reasoning:An Interview with David 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ord, David;YOU, Bin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utite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1 16:23:4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773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1 (2013): 231-246
Copyright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SSN: 2225-6474

在经典互读中的文明对话与宗教学研究

——与英国剑桥大学大卫·福特教授的访谈

Cross Cultural Dialogue and Religious Study in Scriptural Reasoning: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大卫·福特
剑桥大学

游斌
中央民族大学

David 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dff1000@cam.ac.uk

YOU B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youbin99@gmail.com

摘　要

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由于世界各地移民的融入，世界各地宗教文化都能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文明之间对话、多元宗教的和谐相处、在世俗化的处境下宗教的公共角色等问题，在社会公共领域都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因应这些问题，作为英国传统“国学”重镇的剑桥大学神学系提出了“跨信仰对话运动”（Inter Faith Program），尤其是核心人物大卫•福特（David Ford）创造性地提出“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的实践，即基于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具有共同的经典渊源之事实，通过不同信仰群体阅读彼此的经典，来实现信仰间的理解与对话，并由此而重思宗教在社会中的公共角色、宗教学研究的可能路径等。其思路与实践对于具有多元宗教文化背景、试图重新厘定宗教与公共空间之关系的中国宗教学界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经文辩读、宗教对话、经典互读、大学、宗教学

一、经文辩读的学术起源

游斌：尊敬的福特教授，非常感谢您热情地接受我们访谈的邀请。在进入正式的学术访谈前，请您简要地介绍您的学术经历好吗？

福特：好的，我很高兴能再次在剑桥见到你，我对即将在今年10月对贵校的访问也充满期待。我的学术经历是这样的。我从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拿到第一个学位，学习四年的古典学（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后我前往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第二个学士学位，读的是神学。此后我前往耶鲁大学获得了神学硕士，又回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到伯明翰大学做讲师，在那里度过了16载。此后，于1991年我被任命为剑桥的“皇家神学教授”，到今天已有近22年了。

游斌：在近15年里，你发动并深切地参与到一场被称为“经文辩读”的运动之中。请问经文辩读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它有什么样的学术统绪？对你个人来说，是什么样的学术动力使你能够如此投入地从事这一工作？

福特：从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到一个被称为“文本辩读”（textual reasoning）的组织。它萌生于犹太教的当代反思，其中既有《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的学者，又有一些在哲学上很有成就的大学教授。我与伯明翰大学的丹尼尔•哈迪（Daniel W. Hardy，他后来成为我的岳父）一起，以基督教代表的身份参与这一活动，在美国宗教学学会的年会上碰头讨论。

这些犹太圣经学者和哲学家带着现代意识来反思犹太教，尤其是在大屠杀之后如何塑造犹太教。对他们来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进行回答。首先是如何重新从事、重新阅读和重新解释他们的经典文本，即《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他们认为，以前的

阅读是不够的。鉴于犹太人的苦痛，他们必须重读经典，以获取与当下有关并根植于经典的智慧。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包括近百年来的各种现代思潮、人文学科、各种变化等。他们既不想拒斥现代性，但又不愿意由现代性裹携而去。他们必须对现代性进行一些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工作。对第三个问题的回应，后来这也成为这个学术团体的核心标志，即他们作为犹太传统的学者，如何面对其他信仰人群，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为了一起学习如何面对他们的文本、当下的现代处境，跨信仰的工作既能面对当代处境，又能触及自身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后来，我们就一起将它转变而为“经文辩读”，更为强调宗教经典在对话中的价值与意义。几年后，穆斯林学者也加入进来，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组织。我们花费很多年来解决，现在实际上仍然在解决，如何应对彼此的经典文本和传统，以及因此引起的各种问题。

游斌：通常来说，你们是怎样组织“经文辩读”的活动呢？是按照主题来组织不同宗教的经文吗？如何面对不同宗教传统对同一个主题相似但又差异巨大的解释呢？

福特：通常，我们会围绕某个主题，从亚伯拉罕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的经典中抽取短小的经文。有时，我们也会用一些评注的文本作为补充，如《塔木德》、教父著作、《圣训》等。辩读者可以依据自己不同的传统或解释，来阐述自己对于经文的理解。

我们每次的聚会都会围绕一个特别的主题，如宽恕、女性、正义、信仰、债务、暴力等几乎所有问题。对这些文本的辩读，通常由一个简短的介绍开始。要说明的是，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做演讲的地方。你要试图集中注意力在这段短小的文本上，就其展开谈话。你的学术收获是要知道其他传统的人如何理解它，你

也可以从另一传统的角度发表评论。没有人可被允许完全拥有这段文本，独占对它的解释，因为大家辩读的目的是深入到特定的文本看它的意思，并将它放在不同传统的解释之下。通常，每次辩读要最少两个小时才能达到效果，因为我觉得，理想情况下，对某个传统中的一段文本需要花一个小时才能有所理解。讨论小组也要适度的小，当然重要的是，在这个小组中要有不同宗教的代表在其中。

我认为，经文辩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你不必认同每件事情。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在最后达成共识，或者说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文本说的不过都是同一件事情。你也许会找到一些共识，但是你也会发现差异。对于经文辨读来说，重要的一件事是要理解：差异是必须被承认的，并进入讨论之中。比试图解决差异更高一级的做法是提升人们之间的差异的品质。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世界中，有着太多的分歧，而且总是有分歧。抹杀差异，并不能使你达到一个和谐世界。你只有通过学习如何处理差异，才能达到一个和谐世界，并学会在差异中生活。当然你也会有相同之处，但是你越深入地了解其他人是如何解读他们的文本，你就越有可能说：是的，我们并不同意，但是我们也能彼此合作、对话以及在一起学习。

二、经典互读与信仰间对话

游斌：对于不同传统的自身发展来说，你认为经文辩读这样的实践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选择宗教经典的经文作为宗教间欣赏差异、进行对话的起点呢？

福特：我认为，人们参加经文辩读，可能出自不同的动机或原因。这本身就是很好。我参与的动机不一定与你参与的动机相同。有人怀着“穆斯林的原因”，有人怀着“儒家的原因”，有人则出于

“基督教的原因”或者“犹太教的原因”。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参与到这种实践中。当然也有各种不参加的理由，大家不必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背景”。

从不同传统的角度来参与经文辩读，我认为是正当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需要意识到，要与任何丰富、深刻的传统进行对话，你需要经历多年之后方有资格。这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几周的时间里理解任何一种主流传统。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过程，你必须沉浸其中。我在伯明翰从事过从社会实践角度进行的跨信仰合作达 16 年之久，但从来没找到我所追寻的某种精神性的东西。用经典阅读作为跨信仰工作的形式，可以让不同的信仰人群之间建立一个长期关系。在这里你可以与穆斯林探讨与信仰相关的重要事情，即便你并不同意它们。

在一个传统的内部，人们通过经常性的崇拜、学习、社会活动聚会，建立彼此间的理解。在不同传统之间，你需要一种实践，让你年复一年来深化对你自身传统、其他传统以及你所处社会情境的理解。而我发现，比较能处理这种情况的唯一的实践方法就是围绕文本来聚集人群。在跨信仰工作方面，有很多好的实践方式。但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还没有发现有哪种实践能像经文辩读这么好，可以在一种有着长期关系的、涵盖不同信仰人群的团体中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经文辩读”是在信仰间关系、信仰和社会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生态学中的一个特殊的“生态龛”(niche)。它是在那种大环境之中的一个“小环境”。跨信仰的关系经常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实践性的。人们可以在一起做事情，这当然非常美妙。它也可以是一些礼貌性的、礼节性的会议，但是经常不深入。一旦要深入下去，就要建立长久的关系。阅读经文则是帮助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因为宗教经典都是深刻而丰富的书，它们就在信仰的核心处。

这些经文已经在十数个世纪中用不同的方式诠释过了，但在全世界它仍然处于被诠释之中，是上亿人生活的中心。《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不久以后，《古兰经》也会成为传播最广的书。

我认为这些经文都是值得注意的文本。它们会领你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礼拜、祈祷，深入到政治学、伦理学、团体生活、婚姻……是的，包括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事情，包括战争、性别间关系等。你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很多。这就为什么长期从事经文辩读会很有帮助。我还有另一个经验，就是当你与其他传统的人一起学习了许多年之后，你就和他们中的某些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你拥有的这种友谊是一种不一定需要你赞同，但你却信任的东西。所以我想，经文辩读的目标不是达成共识，达成了当然好，但是信任、尊敬、诚实、真诚才是跨信仰工作的关键。

游斌：经文辩读主张欣赏差异，主张各个宗教对自身传统的坚持和对其他传统的深度学习，所以，我们能否说经文辩读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性质，既一方面是一个跨信仰的文明对话项目，另一方面又是特定传统（如基督教）在当代处境之下发展自身的神学运动，可以这样表述吗？

福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述，因为它一次性做了很多的事情，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参与这项活动，他们也不必有同样的动机。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在彼此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一定会构建一个友好的关系。对我来说，它当然是一个基督教传统内的神学事业。我是一个基督教信徒，我最根本的动机是为了知道上帝，我相信耶稣是上帝，所以我深究圣经，但也同时深究别的传统。我也感觉这个根本的动机，即为上帝而行事，同样存在于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信仰之中。

游斌：一些中国读者可能已经读了你写的、在牛津大学出版的

《神学》导论一书，它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而你的《现代神学家》一书也已成为神学教育领域的经典著作，我想知道，作为一个现代神学家，你为什么花费这么多精力从事圣经研究呢？在今日，神学和圣经研究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你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你认为这两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福特：是的，如你所说，圣经研究与神学研究在当代存在着较大距离，这令人遗憾。但这一事实会让奥古斯丁、阿奎那大跌眼镜，那些伟大的现代神学家，如卡尔•巴特、巴尔塔萨也会因为这两个学科的分裂而感到震惊。我认为，尽可能深刻地理解《圣经》经文，对基督教神学来说是一个神圣的领域。

关于这两个学科的理想关系，我认为是，对经文进行神学诠释应被视为神学内在的主要部分之一。实际上，在神学界和圣经研究界中进行的诸多研究，都要将这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我现在从事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对《约翰福音》的神学诠释”。《约翰福音》是一个两千年来对基督教神学一直都非常有影响力的文本。这是John Knox 出版社正在推出的一个神学系列中的一部，它的总名称叫做“信仰”，每一部都是从神学角度对经文的普遍探究。

游斌：经文辩读运动常将用一些隐喻来说明它的工作性质，如把“房屋”(House)比作特定的宗教，把“校园”（campus）比做各个大学，把“帐篷”（tent）比作经文辩读自身，请你解释一下这些隐喻的意思？你认为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福特：正如你所说，经文辩读的参加者们常用一些隐喻，“房屋”指的是各自从属的宗教传统。房子是人们的家，又是人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它用来指犹太教的会堂、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作为一个犹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你最先委身的是你自身的传统，而不是某个公共机构如大学或跨宗教的群体。

“校园”是开放的，人们自由往来，它用来指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百年里，大学几乎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机构。如何塑造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看待宗教与大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我们复杂且多元的社会里，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可以让不同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一起探讨与不同宗教和世俗传统相关的思想、学问、哲学和神学。目前而言，除非在大学里给出这样一个空间，来进行关于意义、真理、实践等方面的对谈，否则没有更好的形式。而如果社会里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对这些重要的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那么，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很危险的。在我倡议之下，剑桥大学建立起一个跨信仰的项目（Inter-Faith Program）。我们刚刚收到 50 万英磅，用于资助一个关于宗教和研究型大学之关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探讨宗教与大学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项目。

“帐篷”居于房屋与校园之间。它可以延请各位来宾，进行有意义的、带友谊性的对话。它用来指“经文辩读”这一运动。帐篷不是用来代替房屋和校园的，它是由来自于不同“房屋”的人组成，即一个由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的学者组成的群体，一起在大学里研习他们的文本。也可以把当地不同传统的信仰群体放在一起学习，或者你可以让人们聚集在一个包含着不同宗教团体的友善之所，讨论一些社会关心的大问题，如健康、医疗或生态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都可以支起不同样式的“帐篷”。大学里的“经文辩读”可以支起这样的一面帐篷。

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人们要清楚，每个“房屋”不仅要对自己的传统负责，而且要对“与其它传统之间的关系”负责，也有责任做到拥有更广阔和更明智的信仰。要做到这一点，每

种传统都需要与大学建立友好的关系，大学也需要给出空间，为那些学术的、以追求智慧为目的的、在不同传统（包括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进行对话与互动提供条件。“经文辩读”是一个既需要学者，也需要不同传统的追随者来共同参与的运动。它可以在大学之中进行，也可以在其他机构中进行。所以，这三者之间的理想状态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参与。

三、经典互读的东西方处境

游斌：当前，信仰间对话是宗教界与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各样的对话方案，其中一个兼具思想力和实践性的方案是“比较神学”，你认为你领导的“经文辩读”与比较神学有何差异？请你在它们两者之间做一比较好吗？

福特：目前，比较神学的实践仍主要集中于基督教与佛教、印度教文本之间的比较和对话。这一实践是由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耶稣会士弗朗西斯•克鲁尼（Francis Clooney）发起的。它要求参与的学者对两个或以上的文本都比较熟悉，如克鲁尼既了解基督教文本，也了解东方宗教的文本。他思考这两种文本可以如何彼此关联，在处理东方文本的同时做神学。或者说，当人们认真对待这些文本，并将之视为神学的一部分时，会如何影响到基督教神学自身的建构。我认为，这是它与“经文辩读”之间诸多不同之中的最重要一点。当然，经文辩读也可以非常开放，不只局限于“亚伯拉罕信仰”。比较神学可能集中于东方宗教，经文辩读主要集中在亚伯拉罕系宗教。这是两者的不同，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差异。

可以说，更重要的差异在于，“经文辩读”是一个社会性的实践，涉及到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之间的参与和对话。迄今为止，比

较神学主要是通过那些与两种或两种以上传统有关的学者来完成的。在经文辩读活动中，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精通多种传统的专家。人们可以把自己的传统带来，倾听其他传统的意见，并与属于其他传统的人们一起从事实践。你不用假定来的人都是熟悉多传统的专家，他们只需要精于一家即可。但对比较神学来说，你确实需要那些熟悉多个传统的专家。我认为，比较神学和经文辩读之间有许多可交流的地方。我目前正在为《现代神学》这个杂志编辑一期专稿，届时从事比较神学与经文辩读的学者们将聚到一起会谈。

游斌：在学术与社会影响方面，“经文辩读”运动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人们也对它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出了批评。一个主要批评是认为它只限于亚伯拉罕宗教，从我们东方的角度来说，也可说是只限于西方宗教，你如何看待这个批评呢？其他宗教如儒家、印度教等同样有历史悠久的经典传统，那么，你认为能否把“经文辩读”运动拓展到其他地区，比如说亚洲或中国文化处境之中呢？

福特：我对拓展经文辩读活动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们之所以从亚伯拉罕宗教开始，进行经文辩读活动，是因为这三大传统的信众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但是，经文辩读在原则上决不限于亚伯拉罕宗教。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宗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像是同胞一样。

从工作强度来说，要将这三大传统聚集在一起，已经是很繁重的工作，要让儒家、佛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和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对话则更加困难。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去发展的事业。你不要指望用十分钟或者开一次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委身于它，需要多年的经营，就像婚姻，直到你们诞下孩子经历了生活的一切，才能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委身感，就难以结出好的成果。

我更愿意说，在亚洲文化的处境下，儒家、印度教和佛教等都是重要的传统。在它们之间的对话，所需要的方法恰如你们在中央民族大学所尝试的，需要献身于长期的共同阅读，共同讨论不同的经文传统，寻找一种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我想在你们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一定会有相当多的分歧，因为你们的经文比之于亚伯拉罕传统下的经文是更加的不同。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游斌：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了一个“比较经学和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希望可以在诸宗教间，包括东方宗教和亚伯拉罕宗教等，开展“经典互释”或“经典互读”，以达致它们之间的对话与和谐。你有丰富的经文辩读的经验，请你为我们的工作提一些建议或介绍些经验好吗？

福特：活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参与者的能力和委身程度。从我的经验来看，首先要做的是，请不同传统的学者参与，但不必太多。刚开始时，经文辩读活动可以是小的群体，但是你们都要一起参与活动，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把那些能够长期开展这项活动的人们集中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建立一个基地是明智的，因为这意味着有了一个可以长期继续下去的机构框架。下一步要做的是，积累更多的经验，建设能够帮助其他人的资料，思考怎样建设一个能够真正良好开展的空间，人们能从经常性的聚会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发等，这是一宏大的计划。也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参与我们的经文辩读活动，也许我们的一些经验能够帮助你们。

四、大学处境下的宗教研究

游斌：你所在的剑桥大学是由国家公共资金支持的公立大学，

而剑桥大学又有非常悠久的神学研究传统，现在你所从事的“跨信仰项目”和“经文辩读”都与宗教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请问你对于公立大学处境下的宗教研究如何理解？在大学或公立研究机构内，神学研究应如何开展呢？当前，人们普遍感觉到宗教研究与神学研究之间若即若分的关系，你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应怎样呢？

福特：基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英国公立高校在神学和宗教研究之间关系的探索，我在所著《基督教神学的未来》一书中，有一章谈到一种被称为“新神学”的宗教研究。我对未来基督教神学发展的预估，有的已经慢慢地发展起来，并在英国经历了很多的试验。作为一条路径，我想它对于其他国家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条错误的道路。一条是建立认信性的大学（confessional university）。当然，我不是反对任何特定的宗教自身来建立自己的学术机构，如佛教的学院、犹太教学院、基督教学院以及穆斯林学院等，这是理所应当的。有些天主教大学甚至办得很好。但公立大学是不一样，不应该办成认信型大学。当然，大学可以与这些宗教自身的学院进行合作，它们也确实互相需要，但大学的性质是与它们很不相同的。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是，它要求大学中的学者只能以一种方式研究宗教，即要求人们在研究宗教时，不过问真理和实践的问题，不让人们以宗教的形式或非宗教的形式回答这些问题。它甚至认为大学不应该与宗教发生任何的关系，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这两者之外，在处理宗教研究与神学的关系问题上，大学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今天，大多数大学是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建立起来的，有着许多不同的传统，所以，大学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也就是说，大学里的宗教研究，应该让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任何宗

教的人能走到一起，进行讨论和学习，为社会做出各自的贡献。

拿剑桥大学来说。这里的宗教研究可以有一个基督徒，像我自己，从基督教角度提出观点或问题；可以有一个犹太人，提出犹太人的立场，为犹太立场辩论；一个无神论者，提出无神论的立场，并论证无神论与宗教的关系。不管人们来自哪个传统，重要的是对宗教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来从事学术、神学、哲学。无论你要坚持什么，都必须以学术的方式来论证。

我认为，我们当前需要的是高品质的“学术中间人”，他们处于宗教和宗教研究、神学和宗教研究之间。大学里应该容许由宗教提出问题、关于宗教的问题、宗教间的关系问题，宗教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都可以是提问者。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在大学里的宗教研究应该拒绝那些与现实宗教、宗教实践相关的问题。但是，这对大学的氛围来说是很不合理的。比如说，大学里有商科、经济学科等，教授商业或管理等问题。在这些学科里面，人们当然地认为它应该包括那些从事现实经济活动、商业实践的人，可以包括商业的圈外人士，也可以包括圈内人士。为什么宗教研究就要排斥它们的圈内人士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宗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应该在大学里研究宗教。人们不应只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而且要有助于宗教的社会实践。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大学里没有神学是危险的，没有宗教研究也是危险的。如果简单地将那些关于真理和实践的问题从大学的宗教研究中排除出去，是非常有破坏性的。

游斌：在英国公立大学中，有一个“政府资助的英国领导阶层宗教素养项目”，是由政府出资在大学中推动人们对宗教有更多的了解，甚至邀请宗教界人士参与。请问这个项目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英国觉得有必要在大学中推动这样一个项目？

福特：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决定在伦敦的高登史密斯大学（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设立一个项目，由著名的学者亚当•迪南（Adam Dinham）来领导。如果你用 google 搜索 “religious literacy leadership”，进入它的网页，你会发现它由几个主要项目如“宗教与公民社会”等组成。现在英国大约有 80 所高校是这一项目的成员，它们在英国大约四分之一以上的高校内开设课程，以确保在这些校园里，人们能够正确而严肃地对待宗教问题，包括不同信仰背景的学生间的关系、住宿与日常生活等。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大学的校园文化来讲是很重要的，他们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我们也希望将这种校园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我们正在联系英国广播公司（BBC），探讨有关“宗教隐私与媒体”的问题；与行政机构讨论“公务员中的宗教”等等。

游斌：我相信，你在此介绍的经验，一定对我们在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的中国建设和谐的宗教间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能够大有益处。谢谢你。

Abstract

With the prominence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ssues of cultural dialogue, harmony between diversified religions, and the public role of religion in a secular society have become a profound and urgent problem for intellectuals. This paper is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Ford, a representative of public theologia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 co-founded the movement of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initiated the Inter-faith Program in Cambridge. Its basic method of conducting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rough reading together different Scriptures, common cultural resource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uld be inspirational for the Chinese religious situation. Issues about the role of scripture in religious dialogue, the principle of scriptural reasoning, the public role of religion, and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Scriptural Reasoning, Religious Dialogue, Cross Reading of Scriptures, University, Religious Studies